

說一輩子散文——散文交流會

時間：2012年4月13日(星期五) 下午2:30 - 4:00

地點：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多用途活動室D

嘉賓：毛尖、黃子平教授、章詒和

主持：馮志弘

紀錄：伍家穎、臧諾



黃子平：「嚮往自然」這個題目，表面看來很像作文題，很平常，小學生都可以作，但是對生活、對人生有體驗之後，應該能寫出不同的東西。這次投稿非常踴躍，共有六百多份（散文組有兩百多份），最後淘汰剩下十三份，十三份裡面再選五份。

法國劇作家莫里哀的劇本裡有一個傻傻的人，到處去問甚麼叫散文？後來有人說，你看你說的話就是散文，然後這個人就特高興。哇！原來我說了一輩子散文都不知道我說的是散文。要把散文變成一個文體的時候，我們就煞有介事界定甚麼是散文，其實可能它恰恰是一個最不用界定的文體，所以任何企圖去界定它，基本上都失敗了。

我們都知道詩歌有嚴謹的理論，但散文理論好像沒有出現。我們讀到一些散文理論，但它基本上還在停留在分類學的階段。分類是所有理論裡面最初級的理論，是賣生果的阿嬤都會做的。先把蘋果合成、分開，然後

在蘋果裡面分成二十五塊錢一堆的、二十塊錢一堆的，各種各類的、簡單的分類標準。我們都不滿足於這種分類學，但是散文理論好像一直沒法從這個分類學前推一步。其實先要做的可能是分別甚麼是不好的散文、失敗的散文。

不好的散文就是不真誠，很多時候要教訓人。我們學習散文是從飯桌上開始，飯桌上通常是老爸有發言權，所以散文一寫起來就喜歡講議論，想把自己的意念灌輸給讀者，這是最失敗的散文。散文擺出一副說服別人的腔調時首先就會失敗，但是現在這種散文特別多。

很多人假裝在抒情，其實是把他的感受、他的意念強加給我們，所以散文最容易曝露一個人的不真誠。寫作，不是在一個很廣闊的空間裡自由奔馳，寫作是在一個擁擠的場所裡頭，有很多他者在一起，有很多時候需要保護自己，用不真誠來保護自己，然後你會傷害到別人，首先是你最親近的人。我們平常會笑我們那些寫散文或者寫小說的朋友，你要出賣誰呢？像毛尖這種寫專欄的作家我是最同情的，她生了一兒子，寫兒子無所謂吧，兒子小，長大後他也不會讀你的專欄，傷害他就沒問題，但慢慢的，周圍的人都給寫進專欄裡去；當然毛尖用的技巧非常高超，用調侃的方式，這是一個寫作倫理的問題，同時也是一個寫散文的難處。

去年我也講過，以前這個世界是表達得不夠，還有很多東西有待我們去表達。但現在這個世界是一個過份表達的世界，就是說，所有的題目、所有的文章都被人家寫過了，都被人家講過了，我們都好像在別人寫過的文字上繼續寫似的。舉個例，朋友的親人去世了，他想表示一個真誠的安慰，張口就說了「節哀順便」，這麼一句成語冒出來，這個真誠的安慰就變成一個冷酷的公事套話。所以為了真誠，我們必須有創意。

章詒和：覺得寫作是個宿命。你有一種內心的渴望，你有情感的衝動，你就有寫作的可能。其實所謂的才情是需要的，但是才情是在這個的後面。

我覺得我們寫作無論小說還是散文，要用情、用心、用智。甚麼東西都不怕重複，只要它屬於你的，你就有了一篇作品。我從來都認為是這樣。

譬如我和毛尖兩個今天吃了一頓飯，在餐館遇到一個人，之後我和她回去後各自寫，絕對不一樣！那是肯定的。我用心的部分，她用心的部分；我用情的部分，她用情的部分；我用智的部分，她用智的部分，是不一樣的。經歷、背景、受甚麼教育，甚麼思維方式都完全不一樣。

我常常覺得，有些寫作的功夫，真還不在筆頭上。從事寫作，不一定要專業，如中文系畢業了，我一定要去做一個職業作家、開一個專欄，其實寫作是業餘的，是隨意的，是你的情感寄託，是你的心靈窗口。

曹禹三十歲以前已完成了巔峰之作，但更多人是踏入中年，經歷了社會，有了感受，有了生活的積累，才慢慢開始寫。不要想名，不要想利，只把所知所想所得講說出來。這個講說絕對是功夫，如果你非常擅講，然後落在紙上它就是好文章。

毛尖：我因為在大學做老師，每次做作業，學生都會問我要寫幾千字？多少字？我覺得這個多少字的概念，已經強有力的改變我們現在寫作的傳統體裁觀，所以我現在覺得五千字以下基本上都可以。

我覺得，寫作其實是蠻老實的一個事情。我最早是一個普通青年，那時候我看金庸，因為最流行，看金庸以後也看《紅樓夢》、《金瓶梅》，當然不是當名著看，覺得裡面有色情才去看的。看多了就變文藝青年，然後就去看海明威，看不起中國文學，覺得看中國文學不夠文藝，去看美國文學，美國文學看了以後就二逼青年了，就去看法國電影《祖與占》，後來出國了、又離家出走了，特別看不起父母那樣的。後來到中文系，覺得又轉回原點，重新回到中國文化。

黃子平：有一年五一節，三個本地著名詩人、學者邀請我一起去東龍島。那年我正好有事沒去，後來他們三人自己去了。到了那個島上，他們一看，哇！感覺好自然！海、岩石、剩下的幾戶漁村人家，特別興奮。一起看

完自然景色以後，卻開始無聊，接著找東西吃，吃完以後更無聊，然後開始聊天，交換人生故事，從國家大事談到初戀，因為只有兩班船來回那座島，上午出發一班，下午五時回程一班。把所有人生故事都交換完後，終於盼到船來了。船從東龍島慢慢駛到維多利亞港，一看見維港燈火，心中極其激動，終於由大自然回到文明的世界！這正是今早張小虹教授所歸納的「自然是生產出來的」，自然就是由這些不自然的人生產出來的。為甚麼有些散文寫得不好，就是因為簡單化，把自然與文明兩邊對立起來，沒有留意它們之間一種非常複雜的關係。人和禽獸之間的一點點不同，它首先是文明的進步，同時又是某種很有價值的東西的喪失。



■ 黃子平

主持：今年初審的幾位評判都有一個共同感覺，就是今年水平下降了。為甚麼會下降呢？可能是老師要求同學寫作文來交文學獎。這桌上兩百多篇文章有很多是用中學以及大學學會的原稿紙來寫的。我看同學的日記、blog、Facebook，比這些文章精彩得多。這些文章跟剛才黃老師說的一樣，講道理、議論，引用很多典故。我想請教三位嘉賓，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能力寫好文章嗎？還是沒有意識要寫真實、自然的文章？

毛尖：我覺得這個跟黃老師在前面說的有關係，就是真誠與創意的問題。我覺得微博上一百四十個字都很有創意。只有一百四十個字，如果你沒有創意，誰會看你？若果是兩千個字，就不需要那樣真誠。所以文學獎

的文章若變成兩百字，那一定會很有創意，很真誠。可能也是要改變形式吧。

章詒和：水準下降的主因，是大家都非常直白地勾勒大自然、批判城市生活、懷念從前失落的東西、對當代東西有所保留。這些感覺應該含蓄地表達，避免直接的寫出來。我來北京以前，看到一個結婚不久的人寫了一封信登在報紙上，叫「我出賣了愛情，我出賣了自己」。文章說他高中時，前面坐了一個身材修長的同學。他家境一般，父母職業一般，學業一般，非常文靜，性格很溫和。從高一直到高三，他們兩個一直很要好，後來各自考上學校，這個女孩不如他考得好。後來兩人開始談戀愛。他們開始想，如果結婚的話還缺甚麼，兩人發現他們甚麼都缺，沒房、沒車、沒錢，甚麼也沒有，只有勤奮地工作。他們兩個算了算，如果各自節衣縮食，大概還要十五年左右才能把基本建設搞好。他們倆互相鼓勵：只要有愛情，未來會很好。

然後有一天，那個男孩到母親的單位，在過道裡碰見母親的上司，是單位的副局長。後來在年會上，那個副局長淡淡地問男孩母親，那天在走廊碰見的是你的孩子嗎？是啊！還行。在哪工作啊？有空把他帶到我家裡來玩啊。他母親就很糾結，就問你有事嗎？局長說，我跟你直說，我看你的孩子挺老實，我家裡有個女孩，也挺老實，老實人找老實人不是挺好嗎？後來兒子就去見了他女兒，也不難看。之後有一天局長找他媽媽說，我女兒對你兒子印象很好，有意思，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下。這下他母親才明白，他兒子的婚事到了一個十字路口，一邊是他高中同學非常相愛，已經談到婚嫁，另一邊就是局長女孩。她就非常坦率的和兒子說，局長的女兒要和你結婚。男孩覺得很難答應，他媽媽就說，你試試吧，那門婚事也沒訂下，有些東西是很實際的。這文章好就好在它非常含蓄，不是直接告訴你，他可有房子有車。文章寫得非常精煉，他刊在報紙上不到一千五百字，感情很強烈，但很含蓄。他說，最後我算了算，我和她奮鬥需要十五年，而和她相交只要一點頭，三秒鐘之內一切皆有。我結婚，我出賣了愛情，我出賣了自己。那文章非常含蓄，甚至有幾分隱悔，但是你看完後會格外心痛，你會想，新婚之夜那個男孩不知會想甚麼。

這些文章就是過於直白，變得非常單薄，文字、主題、內容都非常單薄。這不怪孩子，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教材及教學都弄不好。我記得我小時候在香港，小學一年級有故事課，每一位同學都要上台講故事。這很重要，上去老半天，你講故事的毛病所有同學都能聽出來，這小子講得真沒勁，然後你會想，下次怎樣講才能有勁。你就知道哪些事要遮掩，哪些事要逆轉。



■ 章詒和

主持：接下來是提問時間。

觀眾甲：首先我要恭維一下毛尖女士，從你的文章看不出你這麼年輕，我最喜歡看你的電影評論。我有兩個問題，你認為中國電影有機會拿奧斯卡金像獎嗎？也許你認為拿奧斯卡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，我也同意，但電影人都非常重視。第二個問題，你認為張藝謀有沒有機會？

毛尖：肯定有機會啊！因為現在那個獎項很多時跟國家的國力、經濟實力有關係。中國國力正在上升，世界這麼看重，肯定很快有機會。荷里活現時不頒獎給中國，裡面除了有影像的角力，還有政治角力，覺得我頒獎給你好像在拍中國馬屁。

但荷里活需要中國這麼大的市場，裡面是幾十億的生意啊！黃老師今天說，自然不止是人文課題，還是政治課題。荷里活的獎項也是個政治課

題。中美關係微妙，雖然我們標榜荷里活有美學標準，但中國人拿獎是遲早事情，如諾貝爾獎，中國想拿甚麼獎我覺得都可以了。

觀眾甲：你這麼講我很意外，讓我多說幾句。第一點，我非常不同意你剛才說遲早的事，我覺得他每況愈下。最近看了《金陵十三釵》，我說完了，張藝謀完了，他這樣下去不行啊。我覺得張藝謀拍《金陵十三釵》是他非常想拿金像獎。金像獎有政治因素我同意，但不完全是。比如說，這次伊朗拿了，它是甚麼政治因素？我覺得張藝謀缺乏了金像獎電影所具備的人文關懷，沒有這東西他永遠拿不到。

毛尖：我同意你的觀點，我和你沒有分歧啊。我說張藝謀能拿獎不是在讚美他，不是在讚美荷里活，其實這兩個都有問題，兩個問題碰在一起的話是可以合謀的。張藝謀的能力很高，他能拍奧運會做成那個樣子，他能拍《紅高粱》，他又能拍《一個都不能少》，《金陵十三釵》那麼難拍他也行。《金陵十三釵》他是在試水，他符合了荷里活的一些要點，但是編劇方面未做好，那也是沒辦法。他是個聰明人，他一定要走金像獎的道路的話，肯定不會太遙遠。



■ 毛尖

觀眾乙：請問三位有沒有看廣東或香港的散文？用廣東話寫的散文有沒有前途？有香港特色的散文，就是廣東話、國語和英語夾雜的散文，有沒有前途？

黃子平：三語的散文我很喜歡看，要寫得好不容易，但三語的文章可以學習的範本不是很多，而最近又有新三語：以前是文言文、語體文、口語三種合起來，現在加上了英文，還是廣東化英文。新三語出來以後，寫作難度就更大，所以前途也不太樂觀，必須有經典化的過程，才有後續的模仿，然後推陳出新。

章詒和：我覺得用方言、地方語寫文章是非常重要的。四九年以來，內地大力的推廣普通話，當然非常好，十三億人說話互相聽得懂，但對文學藝術帶來的災難是不可估量的。文章我不說，說回戲曲，四九年初有三百多個劇作，現在只有一百多個，而且只是統計出來的，至於真實有多少誰都不敢說。為甚麼？所有民歌民謠都是以當地語音語言作基礎，如果當地的語音語言方言成語沒有了，你的聲腔就沒有了，聲腔沒有了，民謠、劇作就沒有了。萬山紅也好，彭麗媛也好，宋祖英也好，唱的都是普通話，是音樂學院批量生產製造出來的民間歌手。這問題是致命的。又譬如上海話。你現在到上海去，特別地道的上海話有多少人講？這樣下去，微妙的上海話就沒有了。所以我覺得無論是用當地方言土語寫的，無論是文字或聲音，我們都要特別保護和尊重，要不然我們十三億真的會同唱一首歌。

觀眾丙：章女士，你是用繁體字還是用簡體字寫作的？

章詒和：小說我用電腦寫，散文我用毛筆正楷寫小楷。這個星期天《蘋果日報》會登我寫的白崇禧和白先勇文章，叫《將軍空老玉門關 讀書人一聲長嘆》，上句寫白崇禧，下句寫白先勇，全篇小楷，二十二頁。別人我不管，但我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樣，如果給我機會能用小楷毛筆，我為甚麼要丟棄，我為甚麼一定要用電腦打？如果寫小說當然是用電腦。（毛尖：你看不起小說？）太長了，數萬字啊！抄要抄死。既然從小學校和家裡教了我用小狼毫寫正宮小楷，我為甚麼要丟掉？當我看到周作人的手稿，我感慨萬千，在一張一張草稿紙上面寫小楷，改也在上面改；甯管他漢奸也好，草稿一拍賣就是七百多萬。倒不是因為錢，而是這東西快失傳了，沒有了。

黃子平：他哥（魯迅）也用小楷。用小楷寫作這一點上，你是當代魯迅。

章詒和：還有，用小楷寫的話，會字斟句酌。你會更簡煉一點、更好一點，因為小楷很費工夫，這跟電腦不一樣，呱啦打起來，呱啦又打起來。我不是說我有多麼好，因為我從小這麼練的，所以我應該要撿起來。你們現在這麼忙，我也不主張你給我回家去弄小楷。

